



中国革命史 理论问题研究

何一成 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前 言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稿《中国革命史理论问题研究》，是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何一成副教授主编的。据他介绍，是想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配合我所主编的《新编中国革命史教程》，选择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从理论上深化这些问题，以补充教材的不足；同时，又与三年以前本室方小年副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教学问题研究》一书衔接起来，在它的基础上扩展研究，并采取基本相同的结构方式，从而作为它的姊妹篇而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并且为了扩大研究队伍，提高研究质量，还特邀请湖南商学院马列部廖国华副教授任副主编，由他组织该部一些教师，承担部分题目的研究任务。主编和副主编要我为本书写一个前言，自愧难以胜任，但因与我主编的教材有所关联，又不便于推托，只好将我读完书稿以后的一点感受写出来，聊以充数。

读完这本书稿，我感到它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严密的历史逻辑性。本书将中国近代和现代从鸦片战争、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至中共十四大召开、全面概括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前后 150 多年的革命历史，分做五个题目，即“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思考”、“北洋军阀统治与民主革命从旧到新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建国初期主要矛盾的演变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等，按照

历史逻辑，排列五组文章。首先揭示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的特殊国情，指出认清这种特殊国情对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决定意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着重阐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的易位，由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寻找思想武器到接受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探索和提出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以及革命胜利以后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探索和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继而逐渐探索和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从形式上看，这本书稿只是一本论文集，各个论题独立成篇；但是从内容上看，它又比较完整、系统，具有严密的历史逻辑性，一组一组文章或一篇文章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既有主干，又有枝叶，既有骨架，又有血肉，带有一本专著的特色。

二、广泛的理论探讨性。本书收集的所有论文，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论题比较广泛，并且都能就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样，就使本书具有一种深刻的理论性和浓厚的学术性的特点。

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据我所知，本书最初拟定编写计划的时候，在论文收齐以后最后决定取舍的时候，都强调要突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都强调要突出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传统教育，要把理论教育与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强调要研究现实，着重阐明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毛泽东对中国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其中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阐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保持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的稳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党的领导作用问题，以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等等。在这些研究中，既反对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左”的思想，也反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倾向，许多文章，都能有针对性地阐明某种正确的理论，批判某种错误的观点。同时在论文筛选中，也撤下了一些纯粹考证性、学术性的论题，一些可能在思想上产生某种消极影响的论题，这种突出思想教育因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对于一本配合中国革命史教学使用的参考书籍来说，对于一本主要以青年学生为阅读对象的理论读物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是切合时宜的。

当然，这本书稿也有某些不足之处。由于是一本论文的汇集，各篇的研究和写作水平不够平衡，一些理论和学术观点也不一定能为大家接受，这些都是正常的和难免的。而就整体来说，本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或者是在思想教育方面，都是有价值、有贡献的，值得肯定和赞扬。

刘仁荣

1994年12月

目 录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

人民不断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思考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反思·····	(2)
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方案的斗争及其启示·····	(11)
论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刚强性格·····	(22)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与中国革命·····	(31)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	(39)
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特点·····	(48)

北洋军阀统治与民主革命从旧到新的转变

略论北洋军阀统治的特点·····	(58)
试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66)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主流的形成·····	(78)
五四精神新论·····	(86)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

论我党早期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	(102)
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111)
浅析国民党改组后的阶级构成·····	(119)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	(125)
论国民党全国政权的性质·····	(136)
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特征·····	(142)

继承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	(151)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158)
“和平民主新阶段”辨析·····	(167)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176)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	(184)

建国初期主要矛盾的演变和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浅析建国初期的主要矛盾·····	(196)
过渡时期总路线论略·····	(202)
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历史评价·····	(209)
建国初期反腐蚀斗争的历史启示·····	(223)

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232)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244)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54)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思想论要·····	(268)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280)
试论邓小平的政策稳定思想·····	(287)
浅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	(293)
后记·····	(301)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和中国人民不断探索国家
出路的历史思考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历史反思

同世间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是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在古代和中世纪，当西欧某些民族还处在野蛮的蒙昧时期，中国就已率先一两千年登上了人类文明史的最初阶梯；随后又在数千年的众多领域里创造出当时西欧人所望尘莫及的奇迹，被世界公认为“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经济、文化和科技都居世界的领先地位。17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从欧美各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降生，并很快取得了支配地位，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中国却仍然酣睡在以小生产为主体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摇篮里，明显地从世界领先地位跌落下来。到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利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和罗盘，造出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从那时起至1949年的110年间，西方列强先后向中国发动了数百次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个不平等条约，中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缓慢发展的历史进程。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先进没有成为近代强大的基础，反而沦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自我陶醉的历史惰性导致落后挨打

在古代和中世纪，我们的先辈们之所以创造了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被世界公认为“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就在于它以自己特有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方式，取得和达到了同时

代的其他民族和国家未曾取得和达到过的成就和水平。最初，在人类生产还十分低弱的文明初始阶段，我们的先辈们未曾等到劳动者个体能创造剩余产品才构建国家，而是靠原始共同体的集体协作创造的剩余产品，构成了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先于西欧某些民族一两千年登上了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梯，创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乐文明。接着，在铁器和耕牛相继问世后，生产力发展到已使劳动者个体创造的产品可以取代原始协作劳动而自给有余时，我们的先辈们又在以小生产为主干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先于西欧千余年构建起秦汉等大统一的封建国家，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主干，以编户制为基础，把全国成千成万的小生产者劳动统一编组起来，形成能将全国人力物力以空前系统而严密的组织高度集中起来的巨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优势，尤其是盛唐以自己的先进和强盛给世界留下永恒的记忆。这种长期的先进和强盛，给我们带来的历史影响是什么？一个方面，它给炎黄子孙带来无尽的荣誉和骄傲，永远激励他们的拼搏与进取精神，特别是赋予他们无尽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给中华民族以强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先进又使它的子孙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世界。因为历史使他们相信，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最先进的，用不着再向谁去学习。这就是清朝乾隆所说的“中国”是“聪明睿知之所居”，“万物财用之所聚”，“诗书礼乐之所用”，“异敏技艺之所试”。世界虽大，而我天朝早已“无所不有”。从而养成一种固步自封、高傲自大和自我陶醉的历史惰性，误认为世界上只有自己是最强大的国家，没有应付不了的来自异域咄咄逼人的挑战。正是这种历史惰性，使自己目光短浅，一叶障目，看不到17世纪以后的世界巨大进步与变化，看不到世界文明的天平已急剧向西欧倾斜。那里的封建社会母体已孵化出来的新的阶级力量，以

旧世界无可比拟的新的生产力，摧毁着比中国大统一的封建专制体制要软弱得多的欧洲封建制度，并最终建立起以商品经济取代封建自然经济、以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传统小生产的新的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直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并接二连三地举起屠刀直刺自我陶醉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才使得麻木的中国人从血淋淋的现实中颤栗猛醒。但是这时的中国已经无可奈何地变成了落后的中国，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泥潭而等着挨打。

二、庞大的封建专制制度扼杀了中国封建经济中孕育的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内在生机

高傲自大、固步自封的自我陶醉历史惰性导致中国由先进变成落后，而庞大的封建专制制度则扼杀了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孕育孵化的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勃勃生机。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中国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迫使农民以小生产为基础，世代代曲卷在自然经济的洞穴里，使农民无法获得挣脱封建枷锁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封建主义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之残酷、压迫之深重世界罕见。农民年复一年耕稼收入，除还纳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税租徭役之外，所剩无几，难求温饱。偶遇天灾人祸，便不得不举债卖田，卖儿卖女，挣扎在死亡线上，根本没有余钱剩米去扩大再生产，以扩大眼界，焕发出挣脱封建枷锁的新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而只能作为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负担者发展。这就有利于封建专制统治集团的江山永

固，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只能是奇迹过后的历史沉沦的命运。第二，中国专制主义统治者数千年以来一以贯之的重农抑商政策，扼杀封建社会母体内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保护其封建统治长治久安，总是竭力把一切社会关系凝固化。在宇宙观上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君民关系上有所谓“君权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伦理思想上有所谓“群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切均由“天命”所定；在农工商业上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等等。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总是把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刺激和欲望的工商业视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千方百计地限制工商业、特别是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加上城乡广大人民总是在贫困与死亡线上挣扎，很难拿出剩余产品投入市场，也很难有多少购买力，这就使得私人工商业难以发展。他们只能在封建政权允许的范围内惨淡经营，或者置地买官加入封建地主行列。因此，中国中世纪的工商业始终未能发展成足以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独立阶级力量而掀起反封建的浩瀚波涛。可见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通过对农民的敲骨吸髓的掠夺以及对私人工商业的严厉限制，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进程，扼杀了中国封建经济中孕育的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勃勃生机，从而使自己逐渐丧失了发展变革的活力，而成为一支貌威实亡的纸老虎。

三、闭关锁国导致历史的沉沦

高傲自大，固步自封的自我陶醉的历史惰性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则是闭关自守。由于中国长期的领先地位，尤其在明清以前从未遇到来自异域应付不了的挑战，使之日益滋长着一种

自我陶醉的迷信心理，并逐步转化为一种自我陶醉的封闭心理，最终导致明清时期出现并延续数百年的闭关锁国的局面。这种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是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商品经济要求取代自然经济获得最广阔市场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执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显然是不合潮流的。这种政策的落后性表现在：第一，它无视世界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可能给自己带来的致命威胁，仍以天朝大国自居，我行我素，精神麻木；第二，它下令海禁，不许中国片帆下海，既限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力量的产生与壮大，又断绝了同外国一切正当贸易的发展，必然引起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满；第三，它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出发，断绝中国同外国的一切外交关系，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接触和一切交往，更加重了中国的愚昧与落后，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比如，当英国侵略者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当时的清朝皇帝却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离中国的边疆有多远，这个国家的面积有多大，有多少人口等；第四，它傲然自大，最后屈膝求饶，被迫将中国大门全部敞开。

起初，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击中国大门，要求开放门户，进行通商贸易时，清朝皇帝表现出一副不可侵犯的傲慢态度。一是拒绝接见外国使者，或者即使接见，也得三跪九拜，行君臣之礼。这对西方列强来说，政治上难以接受。二是对西方列强所提开商埠通商，借地方海港修理船坞或停泊船只等要求，认为有失天朝体面，一概拒绝或不予理会。例如乾隆皇帝给英王乔治二世的书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对西方列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三是傲然以武力反击，紧闭门户。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先后完成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西方资

产阶级的商船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同时也来到东方，紧敲中国的大门。可是，中国仍沉醉于汉唐的强盛，未曾想到人民有一天会沦为异国奴隶的危险；亦不想因世势聚变，应奋起直追，内建功业，固国强基，对外广结盟友，抵御外侮。自以为天朝强大到外异入侵，犹如汉唐边患，“将彼复俘来一样，自由驱使”。一旦列强使用近代化技术装备的武装入侵，欲以征服中国，迫使傲慢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屈服时，我们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后，屡战屡败，惶恐、退缩、逃避、投降，被迫接受列强提出的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任凭列强蹂躏与掠夺。昔日独立统一的强国，便一蹶不振地变成了受制于人、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弱国。

历史事实竟是这样残酷无情地教训中国人民：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只能导致历史的沉沦。正确的方针是因势利导，据势而变，内整朝纲，焕发民气，奋发图强，大力提高生产力，发展民族经济，主动开放市场，正确引进和合理使用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及人才，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然而，当时的中国人除了少数先进分子如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等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外，大多数人则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愚弄未能察觉，真是历史的不幸。

四、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人民进行了数百次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救国斗争，什么主义都试过，什么方法都用过。如洪秀全等以建立天国为目的、义和团以神权主义为武器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救国斗争；康有为、梁启

超等以君主立宪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辛亥革命。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国家破坏到了极点，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人民痛苦到了极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农民的神权主义不能救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它们统统让位于马克思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跑了美帝国主义，彻底埋葬了统治中国长达22年之久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四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又消灭了赖以产生阶级和产生剥削的根源，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使中国最终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历史，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完全胜利。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夺取救国斗争胜利的最锐利武器。

五、振兴中华的基础在群众、关键在领导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之一是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昏庸。清朝皇帝从道光至宣统，能成大器

者竟无一人。从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到民国的蒋介石国民党，全是些专弄权术，视财如命的凶暴昏庸之徒。他们为了自己或集团的权势和荣华富贵，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投靠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奋起救国、振兴图强的中国先进分子，无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还是康有为的保国会，或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及其改组前的国民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本身阶级的局限，都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共同的弱点是脱离群众，甚至害怕群众组织起来的救国斗争，因而虽有良好的宏图大略，终究难成大业而先后失败。

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也先后经历过血与火的艰苦磨砺，不断地克服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投机分子、异己分子和腐败分子的破坏与捣乱，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坚强集体，团结了全国各族人民、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人民革命战争，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和扶植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赢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正由于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人民在取得人民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又迈出了三大步：一是开展民主建政，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政治安定的斗争。比如在新解放区建立军管会，组织乡村农民协会，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并在军管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二是发展生产事业，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斗争。比如人民解放军进城以后，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农民，恢复工农业生产，同时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建立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整顿金融市场，统一财政收支，合理调整工商业，集中打击投机商的投机活动，以及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等。三是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的斗争。比如开展‘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党内的整风运动以及禁娼、禁毒、禁赌和革除封建婚姻制度等，一扫旧社会的陈规陋习、世俗观念和共产党内日益滋长起来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腐败之风，并在‘三反’运动中枪决了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等腐败分子，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开展了提倡节俭，厉行节约的反腐倡廉教育，要求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号召全体人民向英雄和劳动模范学习，做新社会的主人。全社会形成一种勤奋节俭、团结友爱、相互关心、助人为乐的社会新风尚。这就为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华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具备了这种良好的社会发展基础，我们在建国后短短的七年时间里，不仅恢复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已是百孔千疮的国民经济，而且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重新崛起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坚强的核心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振兴和崛起。

（余求校）

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方案的 斗争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实质就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改造社会的方案，以便在中国实现全面资本主义近代化。它的范围很广，包括在经济上实现由小手工生产的自然经济向机器生产的商品经济转变，在政治上由君主制向民主制转变，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变。这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变革。

(一)

五四运动以前的80年中，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①，而从经济（或物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主体为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

迈出这个阶段第一步的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的功绩是提出了洞悉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首开了向西方学习的风气。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为了解英国及西方各国的动态，积极组织人力搜集和翻译了大量外国书报。其中最著影响的为介绍了30多个国家历史、地理、政治和风土人情的译著《四洲志》，以及《华事夷言》。为了防范英国侵略军的进犯，他还购买了西洋大炮和船只，

^①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833页。